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o.C2020005

2020-05-11

2019 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年度报告^①

王勇 朱欢 文永恒 惠利^②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起始于中国的转型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场推动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现代主流经济学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新结构经济学是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方法,即理性人的基本假设方法,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的一个学科。其中,经济结构包括决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的各种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本章系统梳理 2018-2019 年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文献,并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当前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为促进未来相关学术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和运用提供参考。

本工作论文系列是新结构经济学最新的尚未在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目的在于学术讨论与评论,并不代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官方意见。本系列论文拒绝接受已发表或期刊已接收论文投稿,文责作者自负。本文由“NSE A0 宏观与经济增长 小组”审核。

^① 本文是《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 2018-2019》中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内容,总结了新结构经济学在 2018.01.01-2019.12.31 的主要学术成果与主要学术活动。

^② 王勇(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Email: yongwang@nsd.pku.edu.cn; 朱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 Email: huanzhu@nsd.pku.edu.cn; 文永恒,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Email: yonghengwen@nsd.pku.edu.cn; 惠利,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Email: hui.li@nsd.pku.edu.cn。

2019 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年度报告^①

王勇 朱欢 文永恒 惠利^②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起始于中国的转型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场推动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现代主流经济学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新结构经济学是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方法,即理性人的基本假设方法,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的一个学科。其中,经济结构包括决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本章系统梳理 2018-2019 年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文献,并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当前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为促进未来相关学术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和运用提供参考。

第一节 研究综述

一、引言：新结构经济学及其体系构建

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也在于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现在国际上盛行的理论去制定政策成功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追赶,少数几个成功实现追赶梦想的国家和经济体,他们在追赶时期推行的主要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于是主流理论便将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条件等作为理论的前提,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些前提条件的差异,把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自然难以实现改造好世界的目的。在此现实背景下,新结构经济学应运而生,旨在总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成效而提炼出的第三波发展经济学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是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方法,即理性人假设为前提,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的一个学科,其中经济结构包括决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换言之,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是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的结构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给定的。如今,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 *Economic Theory* 期刊于 2019 年发表了林毅夫等人的“Convergenc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analysis”,在具有信贷约束的熊彼特世代重叠模型中研究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得到了广泛的引用,林毅夫和王勇在 2018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Oxford Handbook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中撰写了《*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从国内来看,以中国知网数据为例(如图 1 所示),自 2011 年以来,新结构经济学的关注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学术文章的引用率大大提高,

^① 本文是《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 2018-2019》中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内容,总结了新结构经济学在 2018.01.01-2019.12.31 的主要学术成果与主要学术活动。

^② 王勇(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Email: yongwang@nsd.pku.edu.cn; 朱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 Email: huanzhu@nsd.pku.edu.cn; 文永恒,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Email: yonghengwen@nsd.pku.edu.cn; 惠利,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Email: huili@nsd.pku.edu.cn。

相关的学术期刊例如《经济学（季刊）》、《财经研究》、《经济评论》、《当代经济科学》等期刊也先后发表新结构经济学文章，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一定的反响。所以，基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做研究，我们必然会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提出的理论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践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知成一体”的哲学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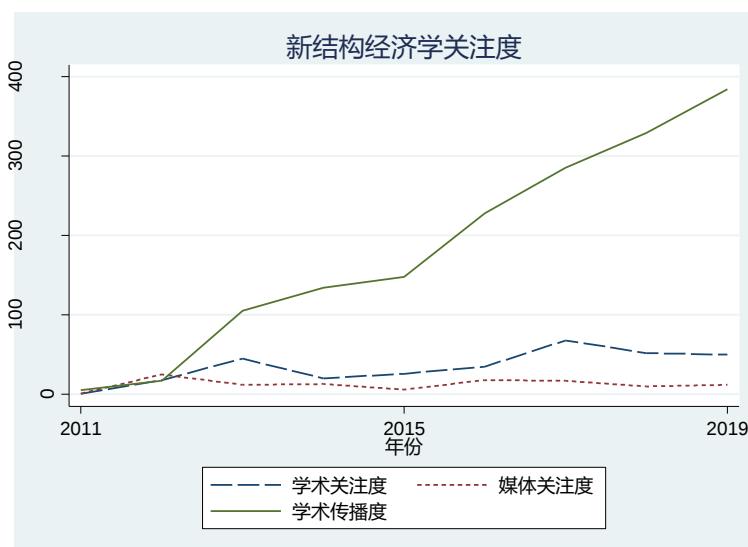


图 1 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年度成果动态^①

本章主要围绕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体系，对两年来（2018-2019）国内外学者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和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重要学术论文和著作进行评价，试图厘清该学科的研究路径、梳理其研究脉络，指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关研究趋势做出未来展望。我们将研究论文划分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理论视角在其他子领域上的运用（产业政策、宏观经济、中等收入陷阱、金融结构、创新、环境经济学等）。

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反思与重构

2018-2019 年，在新结构经济学总体理论与反思方面，主要集中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构建、理论基础探讨、理论综述以及基准模型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首先，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建设方面，2018 年 9 月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举办了《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禀赋内涵的探讨》，首先，林毅夫、鞠建东、王勇等人（2019）^②就新结构经济学的禀赋内涵展开了有益讨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性，因为要素禀赋决定了每个时点上的总预算，要素禀赋之间的比例则决定了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这两者是决策者做决策时的最重要参数，决定了某种类型的产业和技术具有比较优势，这是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结构差异的最关键决定因素。此外，经济发展有赖于产业、技术升级，而产业和技术升级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通过参会老师们的讨论，最后，林老师将禀赋的内涵做了扩展，禀赋就是决策者在做决策的时候，对他来讲时给定的、不能改变的、对决策者有影响的因素就是禀赋，禀赋可以归类为：factor endowments，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其中学术关注度是指篇名包含此关键词的文献发文量趋势统计；媒体关注度是指篇名包含此关键词的报纸文献发文量趋势统计；学术传播度是指篇名包含此关键词的文献被引量趋势统计。检索日期截止到 2020 年 2 月 28 日。

^② 林毅夫，王勇，鞠建东.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禀赋内涵的探讨[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9，No.C2019009.

institution endowments, nature endowment。总的来讲,林老师主张做经济学研究时“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来考虑其背后的理论,而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来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此外,王勇和沈仲凯(2018)^①以禀赋结构为出发点,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引入异质性农户与非位似偏好,构建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考察内生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的程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其次,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讨方面,Lin(2018)^②指出发展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子学科。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是结构主义,第二代发展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遵循上述两代发展经济学,却未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基于以上现状,Lin(2018)介绍了第三代发展经济学,即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借鉴了发展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性质和原因提出新的认识,指出结构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的内生性;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忽视了转型经济体扭曲的内生性。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根据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该文还讨论了政府如何利用产业政策来发挥这种因势利导作用,并介绍了来自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新的理论见解。

最后,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林毅夫教授在2019年2月17日^③就《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给出详细的介绍。其一,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包括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为何要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把结构内生化的重要性以及为何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内生结构分析的核心自变量;其二,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总而言之,从一个经济体结构内生及其影响来研究该经济体的发展、转型,以及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内生差异性的视角来探讨关系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的研究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其三,怎么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一定要从现象出发,而非从理论模型或是流行的研究方法出发,第二,在面对一个现象时要秉持“常无”的心态,第三,回归到亚当斯密,也就是回归到对所解释的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探讨”来,第四,从特殊到一般,第五,要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给定结构的二维主流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内生地具有不同结构地三维经济学。

三、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进展

(一)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有为政府、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

王勇、林毅夫和鞠建东(2019)^④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要素禀赋结构驱动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倡导“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市场主导、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为了更加清晰严谨地阐述这些基本观点及其经济学逻辑,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模型中含有资本与劳动两个要素,多个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产业,且每个产业都具有马歇尔外部性。模型证明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内生变动,生产要素的“有效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可以帮助市场中的企业家和政府更好地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地产业,同时,由于该目标产业存在马歇尔外部性,需要“有为政府”因势利导解决协调失灵,方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地产业升级。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要素禀赋结构经由有效的要素市场价格信号发挥主导作用,帮助政府与企业家更好地识别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目标产业,这是产业政策获得成功的先决关键条件,再由有为政府积极的因势利导,就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产业升

^① 王勇,沈仲凯.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J].经济学(季刊),2018,17(2):801-824.

^② Justin Yifu 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8, No.E2018011.

^③ 林毅夫.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9, No.C2019006.

^④ 王勇,林毅夫,鞠建东.因势利导型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一个新结构经济学模型[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9, No.C2019008.

级。

彭文平和揭阳扬（2019）^①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纳入产业比较优势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探究中，在产业层面研究了比较优势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检验了在产业技术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升级以及地区经济发展路径中，政府和市场在产业比较优势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的“因势利导”作用。基于中国 1998-200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产业比较优势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在培育产业比较优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技术发展不同水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产业发展不同程度上，政府的干预有所侧重，但随着地区经济腾飞，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才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

Lin and Wang（2019）^②基于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经验事实，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多部门结构变迁与产业升级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刻画了生产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的区别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该文证明生产服务业的作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对称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个不发达的生产服务业部门不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性障碍（有时甚至是有益的），但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它就成为发展的重要阻碍。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政府需要干预以防止经济出现过早去工业化，并且政府应该因势利导的促进产业升级。此外，政府也需要适时消除对生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以促进其生产力水平。

Wang、Xia and Xu（2019）^③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轻工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不同应对。使用第一手试点调查数据，该文发现劳动力成本上涨一直是企业面临的首要挑战，尽管技术升级是企业应对的主导策略，但不同企业的反应有很大差异。此外，该文发现行业和企业的劳动密集度是决定企业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同策略的决定因素，更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更有可能选择企业搬迁而不是技术升级。Xu and Hubbard（2018）^④研究了工资上涨是否驱使中国制造商向国外进行外国直接投资以降低生产成本。将中国商务部的海外直接投资登记簿与 2011 年至 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以及地级市的年平均工资数据进行了比对发现尽管高收入发达经济体是中国制造业在海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但与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业相关的劳动密集型轻工制造业却集中在低收入国家，这与“飞雁效应”一致。但是这些只占中国投资的一小部分，大约占匹配的官方 ODI 注册数量的 6%。本研究进一步认为，现在就说要素价格上涨正在系统地将投资推向海外可能还为时过早。

此外，王勇（2019）^⑤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是“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运用。该文结合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的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以及显著的“垂直结构”特点，重点探讨了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于财政政策的含义。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划分的“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和“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分析各自对应的财政政策的差异。师俊国（2019）^⑥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策略：寻找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投资，待到市场培育成熟之后逐渐退出市场，转而投资于新的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王勇（2018）^⑦通过理论模型研究了产业动态、国

^① 彭文平，揭阳扬.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与市场地作用——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9，（10）:80-94.

^② Justin Yifu Lin, Yong Wang. Structural Chang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Middle Income Trap[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9，No.E2019001.

^③ Fei Wang, Junjie Xia, Jiajun Xu. To Upgrade or To Relocate? Explaining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Firms to Rising Labor Cost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9 forthcoming.

^④ Jiajun Xu and Paul Hubbard. A flying goose chase: 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J]. China Economic Journal,2018.3.

^⑤ 王勇.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调整[J].学习与探索，2019，（8）:132-137.

^⑥ 师俊国.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策略[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9）:34-40.

^⑦ 王勇.产业动态、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18，17（2）:753-780.

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林毅夫、向为和余淼杰（2018）^①以中国开发区作为一种典型的区域型产业政策，研究了开发区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

（二）新结构宏观经济学

首先，Lin、Miao and Wang（2019）^②基于存在信用约束的熊彼特重叠世代模型研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基准情况下，货币是超中性的。只有当金融发展超过某个临界水平，后发国家的经济才将赶上并收敛到世界技术前沿的增长率。否则，其经济将趋向贫困陷阱，贫困陷阱中其增长率低于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率，并且通货膨胀率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降低而降低。在这种情形下，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机结合可以使市场均衡达到有效分配。Lin and Wang（2019）^③认为资本是否流向发展中国家取决于该国的发展战略。如果劳动充足的国家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来促进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那么其经济表现将更好，资本回报率更高，从而该国将吸引资本流入。相反，如果政府在不适当的发展思潮影响下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通过各种干预措施来促进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发展，经济表现将很差，资本回报将受到抑制，结果如卢卡斯悖论（Lucas Paradox）所描述的，资本将发生外流。

其次，Wang and Tang（2019）^④运用美国和跨国制造业的长周期经验数据，归纳出六个特征事实：①技能溢价和资本（熟练）劳动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②技能强度和资本密集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③行业间资本劳动比差异显著；④各行业均遵循倒 U 型生命周期的演化规律；⑤资本劳动比越高的行业到达市场占有率最高点的时间越晚；⑥与经济体禀赋结构偏离越大的行业市场占有率越低。基于上述特征事实，其在 Ju, Lin & Wang（2015）模型基础上引入内生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最优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它与技能溢价、产业升级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技能溢价决定于由禀赋结构内生出来的产业结构，且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应该与由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此外，人力资本也要与物质资本的积累相匹配，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力资本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问题。Boldrin、Wang and Zhu（2019）^⑤首先回顾了要素份额的经验证据，发现生产要素份额除了趋势性变化，也显示出一个很强的持续性周期模式，并对导致此现象的根源提出理论解释：在竞争下技术创新模式之下，要素相对价格的内生变化如何导致新技术提高旧技术。在经济扩张后期阶段，劳动要素份额和相对价格上升，造成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激励，新技术的采用引发经济增长，并且在新一轮扩张的早期阶段，劳动力要素份额下降，如此周期循环。该模型与 Ju, Lin & Wang（2015）新结构经济学模型的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后者假定资本是同质的，且所有技术都已经存在，所以是禀赋结构推动的技术选择模型，而前者假定不同代的资本是异质的，而且需要通过创新出新一代资本才能实现技术进步，而包含新技术的新代资本比包含旧技术的旧代资本更能节省单位劳动投入，是资本不断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

再次，过去十几年，中国房产价格稳步快速增长，住房价格年均增长率 10%，相比之下，租房价格年均增长率只有 0.5%，于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传统观点认为房地产泡沫挤出资本投资，造成资本积累放缓，进而降低经济产出。但这种观点无法

^① 林毅夫，向为，余淼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J].经济学（季刊），2018，17（2）：781-800.

^② Justin Yifu Lin, Jianjun Miao, Pengfei Wang. Convergenc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analysis[J]. Economic Theory, 2019.2.

^③ Justin Yifu Lin, Xin Wang.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9，No.E2019003.

^④ Yong Wang and Xuemin Tang. Human Capital,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Skill Premium[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9，No.E2019009.

^⑤ Michele Boldrin, Yong Wang and Lijun Zhu. The Cyclical Behavior of Factor Shares[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9，No.E2019010.

解释中国非住房投资也增加的事实。Jiang、Miao and Zhang (2019)^①在其所构建的模型中引入基础设施作为第三个投资渠道，以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挤入效应”，并且建立一个内生的资产泡沫供给模型，以研究房地产泡沫如果在行业间配置资源。研究表明：土地销售这一政府收入渠道中国是房地产泡沫和非住房投资增长现象并存的原因。模型预测，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产价格将下降 42%，GDP 下降 5.8%，但长期而言，经济产出水平会比房地产泡沫未破灭的情况更高。此外，征收房产税，能够减小房地产泡沫，并抵消售地收入的减少。

最后，Choi and Xu (2019)^②采用 Acemoglu et al. (2016)的方法评估了中国贸易冲击对韩国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影响。采用 1993 年至 2013 年企业和行业的数据，他们的直接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冲击对韩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是创造了 52 万个就业机会。正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中国为支持其向全球的出口扩张而从韩国增加对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需求。进口竞争渠道在制造业就业影响中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同期韩国平均工资下降了 2.4%，收入不平等在制造业中显着增加。此外，还发现中国冲击的直接影响是通过将工人从大公司转移到中小型公司而降低韩国劳动力市场的集中度。

（三）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首先，赵秋运和马晶（2018）^③基于城市化和金融发展的双重视角，借助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研究政府实施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渐趋扩大的机制。基于中国 1996-2011 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长期的正向协整关系，还存在短期的负向协整关系，这表明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在长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而在短期则会缩小收入不平等。其源于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长期具有两种效应：既可以降低城市化水平而扩大收入不平等，又能通过降低金融发展水平而缩小收入不平等，前者的效应更强。而短期内，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仅能通过降低金融发展水平而减缓收入不平等。

其次，余航、周泽宇和吴比（2019）^④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研究了城乡差距、农业生产率变化与农业补贴的关系，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导向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的，他们使用 1986-2017 年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数据发现土地配置效率改进与留守农户平均生产率降低并存，后者部分抵消了土地流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城乡二元结构的“拉力”主导农业生产效率，到经济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的距离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释农村内部农业生产率变动；自上而下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呈现出异质性效果，这能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针对性改善农业生产绩效的重要抓手；以农业补贴为主的各类农业产业政策的“推力”能够有效缓解城乡差距对农业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再次，Wang (2019)^⑤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去）工业化如何与农村收入分配相互作用，并且还探讨了其对 GDP 总量增长、农村收入分配的演变以及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再分配政策有时会通过提高具有高意愿（或生产率）的商品生产来提高 GDP 和福利，这些商品的需求由于收入不平等而受到抑制；再分配政策也可通过内化私人生产和

^① Shenze Jiang, Jianjun Miao, and Yuzhe Zhang. China's Housing Bubbl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E2019008.

^② Jaerim Choi, Mingzhi Xu.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the China Syndrome: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n Manufacturing[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E2019007.

^③ 赵秋运, 马晶. 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传导机制[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6):18-29.

^④ 余航, 周泽宇, 吴比. 城乡差距、农业生产率演进与农业补贴——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10):40-59.

^⑤ Yong Wang. A Model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Income Distribution[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9 forthcoming.

消费决策对未来公共生产率的动态影响来提高 GDP 和福利。

最后,程锐(2019)^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分工视角探析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的机理,并运用 139 个国家和地区 1996-2014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软基础设施具有更为显著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OECD 国家的软硬基础设施均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非 OECD 国家只有软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差距越大则人均收入差距越大,非 OECD 国家软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

(四) 新结构金融学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结构,认为金融结构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就必须跟实体经济的结构特性相符合。首先,在不同发展阶段,其最优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其次,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企业的风险特征也不一样;最后,最优金融结构是动态变化的。因此,早期应该以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为主,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地往大银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的方式来发展(林毅夫,2018^②)。

首先,杨子荣和张鹏杨(2018)^③研究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中国 2001-2008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只有与特定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最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随后,杨子荣(2019)^④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数据考察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金融结构的最优安排以及金融竞争对最优金融结构边界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金融结构的演化趋势,而企业盈利能力的分布决定了特定发展阶段下企业最优融资方式的选择与最优金融结构的具体形式,且金融竞争会改变金融机构的业务边界,进而导致最优金融结构的边界发生迁移。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本文的模型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及演化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本文同时分析了中国金融结构与理论上最优金融结构产生背离的原因。

其次,Gong、Lin and Zhang(2019)^⑤研究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银行和股票市场相对重要性的演变过程。与以前的研究不同,提出了与经济相适宜金融结构的需求侧理论。研究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银行的金融结构比基于市场的结构更为合适,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基于市场的金融结构比基于银行的结构更为合适。这是源于不同的国家产业结构以及银行和股票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不同优势。该发现与最近的经验事实相吻合,并为理解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结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张一林、林毅夫和龚强(2019)^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了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企业最优融资渠道之间的关系,为最优银行业结构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的规模决定了企业的信息特征和风险特征,银行的规模决定了银行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方式,特定规模的银行只有在服务特定规模的企业时,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最低的成本为企业提供最有效的金融支持,由此也决定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对不同规模的银行有着不同的金融需求。此外,林毅夫、张一林和朱永华(2019)^⑦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了发展战略与银行业结构的关系。

^① 程锐.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的机理研究——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分工视域的理论探究和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J].西部论坛, 2019, (1):21-33.

^②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J].清华金融评论, 2018, (09):105-106.

^③ 杨子荣,张鹏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 2018, 17(2):847-872.

^④ 杨子荣.企业盈利能力、金融竞争程度与最优金融结构[J].世界经济, 2019, (6):169-192.

^⑤ Qiang Gong, Justin Yifu Lin, Yilin Zhang. Financ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The Manchester School, 2019 87(2)

^⑥ 张一林,林毅夫,龚强.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管理世界, 2019, (3):31-47.

^⑦ 林毅夫,张一林,朱永华.发展战略与银行业结构[R].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C2019005.

政府对发展战略的选择会相应地决定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并建立起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则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建立由大银行主导的垄断型银行业结构，通过发挥大银行在动员大规模资金上的优势，让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交易成本获取足够多的金融资源。但是，在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业结构下，中小企业会陷入严重的融资约束，这是政府为推行赶超战略而扭曲银行业结构的必然结果和代价。本文指出，发展中国家适合以中小银行为主、大银行为辅的银行业结构，但要建立起这样的银行业结构，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摒弃赶超战略，转而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资本，让资本密集型大企业拥有自生能力，这是成功消除金融抑制（包括大银行垄断、利率管制、政府干预银行贷款等）的必要条件。

再次，任晓猛和张一林（2019）^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种新的最优金融结构度量方法并构建了新结构最优金融结构指标。具体的，采用 1975-2017 年 217 个国家的数据，按照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分组，在同一组中选出人均 GDP 增长水平最高的经济体，将其金融结构对应为该组中心经济体应有的最优金融结构。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均与最优金融结构有关，偏离最优金融结构将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影响在国家/地区收入水平上表现出异质性。

最后，林毅夫、付才辉和任晓猛（2019）^②认为我国金融创新的内涵从需求特色来讲就是金融精准支持的金融产品创新，从改革特色来讲就是金融结构改革的制度创新。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要以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为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则。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总量不足和水平不高，而在于结构性矛盾，导致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低下，跟不上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各地应该结合自身禀赋结构特征因地制宜地采取因势利导的金融创新，以更精准地满足本地实际的金融需求，而不是采取“一刀切”式的做法来落实国家的金融规划与金融政策或模仿其他地区的金融创新。Schclarek、Xu and Yan（2019）^③从理论上研究了商业银行（CB）和国家开发银行（NDB）对企业（投资者）的贷款期限。研究表明，与商业银行相比，国家开发银行向企业（投资者）提供了更长期的贷款。原因是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的价值比商业银行的债券价值（或商业银行在银行同业市场借贷价值）更高，因此在需要进行银行间支付的情况下，银行可以更好地应对流动性问题。国家开发银行债券具有更高的价值是因为国家开发银行由政府所有，与私人银行所有者相比，其资本重组意愿和能力更高。国家开发银行的期限展期能力与它们向实际投资项目贷款的债务或抵押能力、政府的资本重组意愿和财务能力以及他们的流动资产持有量成正比。

（五）新结构创新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创新包含了发明创新和模仿创新，发明创新所要的投入大、不确定性高，而且再不同的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阶段其回报也是不同的，那么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一个处在禀赋结构和生产结构比较低阶段的经济体，对拓展世界技术前沿的发明创新的需求并不高，导致回报也就很低，同时发明创新对投入的禀赋结构需求较高，而此时禀赋结构供给较低，会导致较高的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因此此时发明创新的利润并不高甚至还会亏损，因此，在禀赋结构供给较低阶段，创新应该更多地偏向模仿创新。同理，在禀赋结构和生产结构比较高的阶段，创新应该更多地偏向发明创造。换言之，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技术选择应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

^① 任晓猛，张一林.最优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一种新的度量方法与应用[J].当代经济科学，2019，41（5）：1-10.

^② 林毅夫，付才辉，任晓猛.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金融评论，2019，（11）：3-13.

^③ Alfredo Schclarek, Jiajun Xu and Jianye Yan. The Maturity Lengthening Rol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R].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9，No.C2019006.

首先,朱兰(2019)^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采用1975-1995年48个经济体专利引用数据,构建国家创新能力指标,使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国家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依赖于经济体所处的收入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从收入阶段来看,国家创新能力有助于促进中上等和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从国家创新能力不同维度来看,专利数量和质量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专利集中度、技术周期、知识传播度、自主创新度对中等收入内部不同阶段经济体的作用不同。研究结论从经验上支持了新结构经济学最优创新结构理论,且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

其次,任晓猛和付才辉(2019)^②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来表征企业的不同技术选择,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与专利匹配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尝试为新结构经济学在创新理论上提供微观证据。研究结果发现,在发展初期(低研发投入阶段),实用新型专利对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发明专利的促进效应要在发展成熟期(高研发投入阶段)才得以显现;实用新型专利增长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而发明专利的增长效应却在提高。本文的结论在知识产权保护 and 地域的差异性上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最后,任晓猛,顾夏铭和蒋海威(2019)^③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出发,从产业结构维度上为研发选择差异及其成因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具体的,结合新结构经济学五大产业类型,以产业间技术水平的差异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包含产业结构与产业技术水平的加权指标,并利用1999-2015年间OECD国家面板数据开展研究,实证结果发现,随着产业加权技术水平接近世界前沿,经济体的应用研究占研发总支出的比重呈现倒“U”型变化。同时,本文的研究表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存在相互溢出效应,对于应用研究占比较高的经济体,这一现象尤为显著,对于应用研究占比较低的经济体,产业加权技术水平与应用研究占比呈现正“U”型关系。

(六) 新结构环境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近年来在环境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广泛且深刻的运用,其中,学者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论证了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以及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的若干问题。

首先,郑洁、付才辉和张彩虹(2018)^④认为在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区分权程度越高,则该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将越大,根据地方政府掌握的信息情况,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概率将越高,发展战略就越符合比较优势,地方的产业结构与其禀赋结构相匹配,其中的企业就有自生能力,地区的资本积累速度将可以达到最快,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可能实现长期最快增长,从而地区的财政收入也越多,那么才能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治理环境,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反之,财政分权程度低,造成的环境污染越严重。基于此,作者利用1997-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总体上加剧了环境污染,但是,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地区发展战略遵循其比较优势,从而有效地抑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地负面冲击。

其次,郑洁、付才辉和赵秋运(2019)^⑤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发展战略与环境治

^① 朱兰.国家创新能力视角下的中等收入转型——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12):16-28.

^② 任晓猛,付才辉.发明专利一定越多越好吗?——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理论讨论与微观证据[J].财经论丛,2019,(10):1-12.

^③ 任晓猛,顾夏铭,蒋海威.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结构与研发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2019,(1):49-59.

^④ 郑洁,付才辉,张彩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财政研究,2018,(3):57-70.

^⑤ 郑洁,付才辉,赵秋运.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J].财经研究,2019,45(10):4-20.

理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机制分析,并利用199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的关系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区的发展战略越是违背比较优势,将使得其环境治理水平越弱;发展战略对环境治理分指标各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对现实中环境治理问题的解释更加全面;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使得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进而弱化了环境约束,并会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严重,从而降低环境治理水平。

再次,Wang、White and Muger (2019)^①基于2000年至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转型之间的关系。经验事实表明,中国的能源转型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所不同,在不同部门也有所不同。采用静态模型(Fama-MacBeth, OLS, 固定效应)和动态模型(difference and system GMM)分析国家和四个分部门级别的数据(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居民部门)。在国家层面,发现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呈U形曲线关系。但在住宅级别,它是倒U形曲线。农业部门的关系不明确;而在工业和服务业中,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无关。此外,还发现能源价格、自然资源禀赋、环境政策和技术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能源转型。自2005年国家能源转型计划启动以来,能源转型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表明这种产业政策有效地促进了能源转型,并且能源市场改革可以消除摩擦或扭曲以促使中国向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过渡。

最后,魏丽莉和杨颖(2019)^②以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论视角,将历史回顾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西北地区绿色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发展动态;构建了包括金融规模、绿色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维度的八个指标来测度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将产业结构分为高级化、合理化和绿色化三个维度。基于2000-2017年西北地区的面板数据发现,在时间维度上,西北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从长期持续的拮抗阶段开始转向磨合阶段,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转向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在空间维度上,除了新疆与甘肃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好的状态,其他三省的耦合协调度较低。

(七) 新结构经济学在其他方面的运用与探讨

林毅夫(2019)^③论述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首先,该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同时归纳了国有企业改革各阶段的特点,其次,文章解释了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是其效率低下和预算约束的根源,最后,根据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现状,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Lin(2019)^④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结构变化与人们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消除贫困,然后讨论了如何使这些改变变为现实。研究发现为了减少并最终消除贫困,增加个人收入将成为第一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结构性变化与收入增加有关。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结构变化通常都会伴随着新技术和就业机会,这将帮助人们提高收入。

通常认为行业的生产函数在经济系统中是外生给定不变的。但是, Lin、Liu and Zhang(2019)^⑤发现相同行业的资本份额在不同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巨大的异质性。随后其建立了一个多行业的一般均衡模型,用于研究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每个产业的技术选择。在其模型中,除了投入的数量外,企业还可以选择生产函数将不同投入组合起来。研究发现资本要素赋的增加将压低资本价格,进而提高每个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并导致出现从劳动密

^① Dong Wang, Ben White, Amin Muger. China's Energy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National and Sectoral Level Analyses[R].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E2019004

^② 魏丽莉, 杨颖.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的历史演进——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24-35.

^③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改革[J].社会科学战线, 2019, (1):41-48.

^④ Justin Yifu Li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overty elimination[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9.9.

^⑤ Justin Yifu Lin, Zhengwen Liu, Bo Zhang. Endowments, Technology Choices and Structural Change[R].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C2019005.

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结构转型。在此过程中，技术选择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基于该模型计算了美国制造业（1958-2011 年）中的技术选择，并反推出该模型的关键参数。定量模型的反事实分析表明，由资本积累驱动的技术升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转型。

付才辉（2018）^①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下提出了最优生产函数理论。该文通过标准化的简约模型形式化了一个完整而简洁的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阐述了以资源最优配置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向以结构变迁为核心的新结构经济学范式的转化，将外生的 CD 生产函数转换为内生的 AK 生产函数，推导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并拓展了结构变迁中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多维禀赋结构的专业化分工和统一增长问题。随后，付才辉（2018）^②也对新结构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进行了初探。

新结构经济学在区域经济学上的运用，比如，朱兰、王勇和李泉剑（2019）^③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一个区域内城市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并将要素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纳入进行统一分析，并以宁波与上海产业融合为例，展示了该分析框架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应用。

四、 评论与展望

通过对上述研究综述可知，新结构经济学近年来在产业升级、产业政策、宏观经济学、收入不平等、金融结构、创新、环境经济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不断在其他经济学科的子领域中通过引入结构视角和发展阶段的探讨而得到新的理解。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就当前而言，新结构经济学仍处于“初创期”，所以目前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主要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学术文献，尤其是在国际顶级期刊和国内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量较少，对于很多经济学问题只是处于定性探讨阶段，缺乏严谨的数理模型或实证模型进行学术分析。因此，如何尽快的将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理论假说得到验证成为接下来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在新时期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大有作为：

首先，发掘关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的稳固典型事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典型事实是什么？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建立，其中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事实是什么？我们认为，发掘类似于 Kuznets 事实，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者努力的基本方向之一。这种典型事实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还应该体现在产业、企业等微观层面。比如，企业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尤其是在企业自生能力假说下，如何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下实现产业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基于稳固的典型事实，构建能够体现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如前文所述，近年来新结构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在 Ju, Lin and Wang(2015)的模型中探讨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决定产业结构等，未来的发展需要引入各种摩擦、软硬基础设施来讨论政府和各种制度安排的作用。从方法论上，可以将结构更好的引入阿罗-德布鲁德一般均衡模型中，发展出能够更好体现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分析框架与数学方法。

最后，基于更加翔实可靠的微观数据、宏观数据以及计量经济学新近发展的因果识别工具，建立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变量间的因果联系。同时，积极寻找更好的实证指标，比如发展战略 TCI 指标的重新构建，此外，新结构经济体提倡“知成一体”的哲学观，将新结构经

^① 付才辉.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J].经济评论, 2018, (1):3-46.

^②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初探[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71（6）:129-138.

^③ 朱兰, 王勇, 李泉剑.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以宁波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R].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C2019010.

济学在实务界的应用整理成案例报告或智库报告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我们期待国内外学者一起努力并在新结构经济学这座“理论金矿”上能够尽快实现突破。

第二节 重要论文

1. Justin Yifu Lin, Jianjun Miao and Pengfei Wang: 《Convergenc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analysis》, 《Economic Theory》 2019.2

研究背景: 工业革命标志着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在 19 世纪, 西欧和北美的许多技术领导者跃居世界前列, 而其他国家则落后于此, 并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独立, 开始他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可能有人期望随着技术的普及和后发优势的出现 (Gerschenkron (1962)), 世界应该见证各国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收敛, 但与此相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一个持续不断加速分化的时期 (Pritchett (1997))。根据麦迪逊 (2008 年), 美国作为 20 世纪最先进的国家, 在 1950 年至 2008 年期间, 其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 2.1%。除少数 OECD 国家与东亚经济体能够以年均增长率高于美国以缩小其人均 GDP 差距, 拉丁美洲, 亚洲, 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未能做到。尽管存在技术转让的可能, 但为什么大部分国家仍无法实现增长率收敛?

基本结论: 该文基于存在信用约束的熊彼特重叠世代模型来研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基准情况下, 货币是超中性的。只有当金融发展超过某个临界水平, 后发国家的经济才将赶上并收敛到世界技术前沿的增长率。否则, 其经济将趋向贫困陷阱, 贫困陷阱中其增长率低于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率, 并且通货膨胀率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降低而降低。在这种情形下, 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机结合可以使市场均衡达到有效分配。

主要贡献: 该文的贡献是将货币引入 AHM (2005), 并研究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才能使市场均衡实现有效配置。该文发现新增货币转移给代理人的方式对于货币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是重要的。当新增货币按比例转移给代理人时, 货币是超中性的。但当经济体处于足够低的金融发展水平, 经济就会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贫困陷阱。当新增货币是转移给最需要钱的年轻企业家时, 货币就不是超中性的。货币政策将通过再分配机制影响实体经济。政府应首先改善信贷市场状况, 以使企业家不再受信贷约束。存在着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组合, 使经济可以避免进入贫困陷阱并实现有效配置, 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将在一段时间内以更快的速度收敛, 最终达到与世界前沿相同的增长速度。

现实意义: 该文发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采用不同的政策。当经济面临严峻的信贷市场不完美时, 政府应设法通过加强合同执行力以及更好地监督借款人来放松信贷约束。只有这样经济才能避免陷入贫困陷阱。

2. Justin Yifu Lin and Yong Wang: 《Structural Chang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Middle-Income Trap》,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2019

研究背景: 世界银行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介于一千到一万两千美元的经济体定义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基于这一标准, 1960 年全球共有 10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 而截止到 2008 年, 其中只有 13 个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变成高收入经济体 (Agenor, Canuto, and Jelenic 2012 年)。换句话说, 超过 87% 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增长速度因不够快而无法进入富国俱乐部。该文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

基本结论: 基于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经验事实, 该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多部门结构变迁与产业升级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刻画了生产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的区别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该文证明生产服务业的作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对称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一个不发达的生产服务业部门不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性障碍 (有时甚至是有益的), 但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 它就成为发展的重要阻碍。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政府需要干预以防止经济出现过早去工业化, 并且政府应该因势利导的促进产业升级。此外, 政府也需要适时消除对生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以促进其生产力水平。

主要贡献：该文提出了一个在产业升级与结构变迁中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机制，此外还通过以下方式对结构变化文献做出新贡献：（1）将生产服务业与消费服务业区分开，并将制造业分为基础制造业和高质量制造业，（2）通过不同子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来凸显生产服务业的非对称作用，以及（3）研究存在国际贸易与不存在国际贸易两种情形下结构变迁（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与产业升级（制造业内）这两个相关的过程。

现实意义：中国应通过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更多准入以进一步改善上游生产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发展出高效的生产服务业，从而促进制造业内的产业升级和向服务业的结构变迁。此外，该模型还提醒我们，如果政府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不作为，可能会阻碍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进程，也可能导致过早地“去工业化”。

3. Fei Wang、Junjie Xia and Jiajun Xu: 《To Upgrade or To Relocate? Explaining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Firms to Rising Labor Cos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9 forthcoming

现实背景：中国在 70 年代末开始市场化改革，通过吸引东亚四小龙，尤其是韩国，香港和台湾的轻工制造业企业，抓住了机遇窗口。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制造业与中国大陆潜在的比较优势非常吻合，这有助于挖掘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这项改革使中国在过去的 40 年中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被称为“飞雁”模式。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基本结论：该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轻工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不同应对。使用第一手试点调查数据，该文发现劳动力成本上涨一直是企业面临的首要挑战，尽管技术升级是企业应对的主导策略，但不同企业的反应有很大差异。此外，该文发现行业和企业劳动密集度是决定企业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同策略的决定因素，更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更有可能选择企业搬迁而不是技术升级。

主要贡献：该文旨在解释中国轻工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不同反应。为此，该文在理论上，通过采用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即资本劳动比）如何影响行业层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应对策略来完善新结构经济学（NSE）的理论。

现实意义：在实践方面，该文可以就如何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不同的应对政策向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以帮助他们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挑战。

4. Yong Wang: 《A Model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Income Distribution》,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9

现实背景：该文旨在探讨（去）工业化过程与农村收入分配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

基本结论：该文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去）工业化如何与农村收入分配相互作用，并且还探讨了其对 GDP 总量增长，农村收入分配的演变以及福利的影响。再分配政策有时会通过提高具有高意愿（或生产率）的商品生产来提高 GDP 和福利，这些商品的需求由于收入不平而受到抑制；再分配政策也可通过内化私人生产和消费决策对未来公共生产率的动态影响来提高 GDP 和福利。

主要贡献：该文从多个方面为工业化和结构转型文献做出贡献。首先，该模型的一个主要新颖特征是，恩格尔定律是由准线性效用函数刻画，该函数不同于以往文献中的标准非齐次函数。其次，该文通过展示当部门生产率变化是内生时，（去）工业化是如何运行的，为

结构变迁文献做出了贡献。该文还研究了农村收入分配的决定力量以及其在结构变迁和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动态演变。

现实意义：该研究表明，农村收入分配和（去）工业化具有内在联系，因此，一个过程的政策或制度扭曲通常会影响另一个过程。再分配政策可能会通过促进工业化来提高 GDP 和福利。

5. 张一林，林毅夫，龚强：《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管理世界》2019 年第 3 期。

研究背景：在任何国家，银行业都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然而，不同国家银行业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但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国内银行的平均规模往往越大，银行业结构越偏向于以大银行为主导。为何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这样的关系？银行业的结构如何影响银行业的整体效率？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结构是否适合于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最优”的银行业结构，最优银行业结构是否会随着该国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有助于针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特征制定相适应的金融发展与银行监管政策。

基本结论：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企业规模与企业融资渠道偏好的关系，为“最优银行业结构”理论提供一个微观基础。首先，考虑了一个由连续统的企业和银行构成的经济，其中银行分为大银行和小银行，所有参与者均为风险中性。企业和银行的所有者同时也是各自的经营管理者，企业和银行内部无委托代理问题，企业间以及银行间都为完全竞争。其次，构建了企业融资与大小银行的博弈时序，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大银行和小银行决策方式的差异。再次，大银行融资和小银行融资的最大区别在于提供资金的前提条件不同，大银行的规模特性决定了大银行难以有效甄别企业的软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大银行提供资金的前提条件是企业拥有足够的抵押，大银行利用抵押和清算制度防范企业家风险。小银行提供资金的前提条件则是小银行自身具备足够的软信息甄别能力，而企业是否拥有足够的抵押并不构成小银行提供资金的必要条件。最后，研究表明企业的规模决定了企业的信息特征和风险特征，银行的规模决定了银行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为企业金融支持的方式，特定规模的银行只有在服务特定规模的企业时，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最低的成本为企业提供最有效的金融支持，由此也决定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对不同规模的银行有着不同的金融需求。总之，大企业选择向大银行融资能够最小化贷款利息支出，中小企业从小银行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

主要贡献：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了企业规模、银行规模和企业最优融资渠道之间的关系，为最优银行业结构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扩展了已有文献只关注银行业结构的供给层面，而忽略了银行业结构的需求层面，正如本文指出，不同规模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企业特性和金融需求特征，而不同规模的银行具有不同的融资特性和比较优势，只有当企业的特性与银行的融资特性相互匹配时，银行的比较优势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金融需求才能得到充分满足。

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本文的研究为中国未来银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一，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中小银行的金融需求；第二，发展中小银行需辅以审慎监管，对中小银行实施严格的资本金要求；第三，发挥大银行在支持大企业和大规模投资方面的比较优势，适当减少大银行承担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负担。

6. 郑洁，付才辉，赵秋运：《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财经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研究背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环境问题也愈发重要，国家将污染防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不仅如此，学术界也认为环境治理是解决环境污染

问题的有效手段，立足于我国现实，发现我国仍然存在长期环境治理严重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式地方政府竞争机制。但是，已有研究未能较好的解决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并且大多是基于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对其进行解释，暗含了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等。于是，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分析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的相关问题。

基本结论：本文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理论，提出三个假说，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发展战略越是违背比较优势，环境治理水平越不足；二是发展战略越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地区，其企业自生能力将越弱，导致环境治理水平也越低；三是发展战略越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地区，其财政赤字将越严重，环境治理水平也越低。为了验证以上三个假说，本文基于1997-2016年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到了与假说一致的研究结论。

主要贡献：本文立足于新结构经济学，从企业自生能力出发对环境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解释。本文的可能贡献有三个，一是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治理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并识别出其主要影响机制，即企业自生能力机制和财政赤字机制；二是在环境治理指标选取上更为全面，根据污染产生过程和政府环境治理手段，选取地方环保法规和行政规章数、排污费、行政处罚案件数、环保人员数和环境治理投资总额等五类指标，并利用熵权法构造环境治理综合指数来度量环境治理；三是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根据已有研究和我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逻辑，较为创新地选取“离受威胁地最短距离”和“老工业基地数目”作为发展战略的外生工具变量，有效识别发展战略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

现实意义：以上研究对于中国未来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环境治理的最优是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的内生结果，只有当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才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成为硬约束，企业在此条件下才会激发初绿色技术创新、优化产能结构，走上波特效应的发展路径，不仅如此，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决定了环境治理的外部性，那么政府环境治理上需要更有作为。

7. 王勇：《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调整》，《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8期。

研究背景：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在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与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

基本结论：首先，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著特点。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对于经济转轨过程，需要研究补贴和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低效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对于经济开放过程中，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对于大国崛起过程，需要考虑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其次，按照新结构经济学五大类产业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和换道超车型产业，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战略型产业应该增加财政政策，鼓励自主创新；追赶型产业，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尤其是对发达地区要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服务；领先型产业中处于技术前沿，需要注重研发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效率问题，同时，还要考虑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

均衡效应；针对转进型产业应该从产业国际转型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在财政上给予扶持等。最后，阐述了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执行效果，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主要贡献：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是“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运用。

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的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以及显著的“垂直结构”特点，重点探讨了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于财政政策的含义。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划分的“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分析了各自对应的财政政策的差异。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外部宏观环境，以及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如何调整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

8. 林毅夫：《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研究背景：林毅夫教授自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拿到博士学位开始，独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有三十余年，本文系统梳理总结了林毅夫教授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问题的一些心得。

基本结论：首先介绍了林毅夫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有关农业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农业生产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现代化三个方面；其次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基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在2009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过程中首次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来说是以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作为切入点，倡导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主张在每一时点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强调思想理念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上的决定作用。最后，介绍了林毅夫教授在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史、中国文化复兴和经济学方法论等领域的研究。

主要贡献：该文系统梳理了林毅夫教授多年的研究成果，使得我们更好的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以及在未来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座理论的金矿，值得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实现。

现实意义：理论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有别于现有的发展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让我们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

9. 林毅夫，向为，余淼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研究背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生产率迅猛提升，经济增速耀眼，有关研究指出产业政策促进企业优异表现，而经济开发区作为一种典型的区域产业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区域型产业政策可能造成开发区内资源与经济活动集中，开发区外资源缺失，换言之，在给定区域内，经济开发区对开发区内经济影响积极，对开发区外的经济活动造成消极影响。因此，经济开发区对于地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不明确。此外，从研究内容来看，以往文献关注地区宏观加总变量，无法较好的理解微观企业的经济绩效。因此，本文基于企业生产率视角，研究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与企业生产率的关联。

基本结论：通过利用2000-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

地理信息，有效识别企业是否位于经济开发区内，并采用系统 GMM 方法和 LP 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使用扩展的 OP 方法和 LP 方法所估计的企业生产率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使用经济开发区内企业到高速公路的对数距离倒数的最小值作为经济开发区哑变量的工具变量，较好的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提升作用。本文检验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四种机制，发现经济开发区内企业的“生产率溢出”并非由政府挑选高生产率企业所致，经济开发区主要通过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比如更低税收）来提升企业生产率。从企业生产率视角出发，经济开发区内的集聚效应并不明显。

主要贡献：本文首次使用微观数据与严格计量方法探究区域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丰富细化对于区域型产业政策效应的理解；第二，本文着眼于企业这一微观决策单元的表现，为评估中国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效果提供全新思路；第三，本文对解决关于经济开发区实证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做出一定贡献。

现实意义：从新结构经济学“有为政府”角度来看，政府应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经济开发区内的产业布局方面，相关部门应考虑如何有效促进形成企业间集聚效应。

10. 王勇：《产业动态、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18 年第 2 期。

研究背景：国际贸易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产业动态？在既有文献中，尤其是实证研究中国家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而关于国际贸易和动态贸易政策对工业化和产业动态生命周期的影响，多数是使用封闭经济模型研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结构组成的演变，未能较好刻画国际贸易是如何影响经济起飞的。基于此，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国际贸易对产业动态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本结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两个大国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模型，讨论国际贸易与动态贸易政策将如何影响产业的动态生命周期和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主要发现有两点，一是产业升级和宏观经济增长是内生性地同步进行地，而且，当且仅当跨期替代弹性大于 1 时，发生在贸易伙伴国的投资专属的技术进步才会促进本国的产业升级和总体经济增长；二是贸易自由化的加速对宏观产出增长和产业动态的影响是非单调的。

主要贡献：第一，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给出一个理论上统一解释，论证了贸易和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可能是非单调的，在国际贸易及动态贸易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本文首次强调了跨期替代弹性的重要性；同时，在经济环境中存在无穷多个具有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产业，这种设定更加符合现实，这样可以在微观层面探究在无穷无尽的产业升级过程中，贸易对于每一个产业的动态生命周期的影响。

现实意义：解释了以往实证研究中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问题，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分析国际贸易、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11. 王勇，沈仲凯：《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经济学（季刊）》，2018 年第 2 期。

研究背景：在现实中，个体消费是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丰富，不同商品之间存在一定的消费次序，另外，同一类商品往往也存在多种生产方式，从资本密集度上分为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产业生产方式向着资本密集度转变。基于美国 1958-2011 年的 473 个制造业数据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总是由相对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转移；此外，利用世界银行 All the Ginis 项目等数据也显示劳动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换言之，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在此基础上引入收入不平等结合禀赋结构这一供给侧的影响,进一步考察需求侧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

基本结论: 本文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引入异质性家户与非位似偏好,构建一个具有无穷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考察内生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产业升级定义为同一产业内部的生产技术由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而后者由于实现了机械化与标准化的生产,所以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研究发现,劳动资本比的上升、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固定成本上升或生产率水平下降,均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模型还证明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线性的负相关关系。该文还发现,收入越不平等,则产业升级所要求的总体经济的最低禀赋结构水平反而越低。此外,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的程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主要贡献: 该文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通过理论模型考察了禀赋结构与收入分布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构建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考察内生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了劳动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此外,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本文也提供了一个从产业升级维度解释各国劳动收入占比普遍下降的趋势。

现实意义: 本文对未来有三个重要的拓展方向,一是考察开放经济条件下,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二是考虑动态系统;三是考察多种要素不平等,例如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等。

12. 林晨, 陈斌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基于历史投入产出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研究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大推进”、“中心-外围”等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因为政府的干预有利于克服投资领域的市场失灵、并可以带来规模收益,帮助落后国家脱离贫困陷阱,但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会带来市场扭曲、资源错配等负面后果。基于此,本文基于历史投入产出表从经验上回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否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构造多部门模型刻画轻工业技术选择与重工业技术之间的关系,轻工业的技术选择不仅取决于轻工业技术本身的特征,还受到本国重工业基础的影响。理论模型显示当重工业技术水平较高时,密集使用重工业投入的轻工业技术效率较高,而当重工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密集使用劳动的轻工业技术效率较高。进一步通过微观与宏观的数据显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高了重工业的技术水平,但没有改变轻工业技术选择的方向。1957-1992年的技术效率变化中,1957-1973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34.3%,1973-1987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量贡献了-14.1%,而1973-1987年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55.8%。

主要贡献: 第一,通过整合宏观统计数据 and 微观企业数据构建了中国1957-1973年历史投入产出表,刻画了重工业部门的前后向关联和技术外溢效应。第二,基于古典多部门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刻画了产业间关联效应,分析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对轻工业技术选择的影响,从产业关联视角拓展了新结构经济学最优产业/技术选择的理论框架。第三,以历史投入产出表数据为基础,量化研究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长期影响,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政府作用,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做出有益补充。

现实意义: 对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技术效率提升有一定作用,但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技术的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13. 杨子荣, 张鹏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的实证检验》,《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研究背景: 已有文献中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结论并未达成一致,然而,金融市场

是否一定是比银行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是否应当模仿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上进行赶超？决定一国最优金融结构的根本因素究竟是什么？这都是本文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基本结论：本文提出两个理论假说，一是金融结构只有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能够促进产业增长；二是金融结构只有与特定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选取中国 2001-2008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条件下，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主要结论有当产业结构以低风险产业为主时，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产业增长，而当产业结构以高风险产业为主时，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则是更优选择；产业结构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相符合，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符合，是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大必要条件。

主要贡献：本文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相互匹配的角度对最优金融结构进行探讨，主要的贡献有：第一，本文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为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的巨大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为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发现金融结构只有内生于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体系地效率，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本文为中国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如何最优制定金融发展战略与金融结构安排提供了现实依据。

现实意义：本研究对于中国金融结构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在样本期内，银行是更符合中国实体经济需求的融资渠道；第二，应注重产业结构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相适应，是发挥金融体系资源配置与风险分散等功能的基础；第三，加强金融机构管理，完善金融结构功能，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有效发挥其作用。

第三节 重要著作

1. Justin Yifu Lin and Alojzy Zbigniew Nowak: 《New Structural Policy in an Open Market Economy》

研究背景: 这本新的双语出版物是由林毅夫教授和 Alojzy Z. Nowak 教授共同编辑出版, 是对两位教授在 2017 年出版的《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or Less Advanced Countries》中所讨论问题的延续。

内容提要: 本书分析了当前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困境。寻找新的系统解决方案来解决全球范围内遇到的若干问题, 似乎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然而, 新结构经济学为许多与发展有关的困境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比如, 政府在参与经济发展过程的规模、作用和性质。

基本结构: 全书包括两个部分 11 篇学术论文, 包括: (1) 全球经济的未来是什么? (2) 自由贸易还是不受束缚的国家/企业利益? (3) 关于新全球经济的欧洲政策议程; (4) 世俗的结构过程, 意外的结果; (5) 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资本控制; (6) 因势利导的政府与经济发展: 政府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作用; (7) 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现代化以及经济创新性提高中的运用; (8) 追赶 OECD 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9) 波兰外国投资的法律环境; (10) 政府可以变成汽车创新中心吗? (11) 波兰走上中国丝绸之路: 发展的机遇还是挑战?

研究意义: 本书是向读者提供的第二本波兰文-英文双语出版物, 旨在激发人们对其所考虑主题的讨论。本书分析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 并研究了采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准则, 那些希望赶上最先进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该书还对波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作了坚定而合理的陈述。

2. 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 《产业政策: 总结、反思与展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研究背景: 2016 年 8 月 21-22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在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产业政策研讨会”内容为基础, 同时邀请了在此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对产业政策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在产业政策、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领域共同探索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相结合的有效路径。根据参会人员的讨论等整理成该著作。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 产业政策在经济增长、转型与升级等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 产业政策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的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过去所执行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在既有的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问题? 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的依据是什么? 应该如何着手?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系统回答上述问题, 对于破解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基本结构: 全书共 6 章, 第 1 章介绍了产业政策的林张之辩, 包括林毅夫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 张维迎教授“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以及林毅夫教授对于张维迎教授的若干回应; 第 2 章对现行产业政策的总结与反思, 许成钢、黄益平、寇宗来等教授论述了制度在产业政策中的作用, 怎样才算好的产业政策, 以及在“特惠”视角下产业政策的关键问题等; 第 3 章介绍了产业政策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赵昌文教授系统分析了产业政策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王勇副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分析了产业政策中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戚聿东教授分析了产业政策的竞争转型, 付才辉研究员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产业政策的边界及其作用方式的界定给出了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作用, 耿曙研究员和陈伟研究院分析了“发展型国家”的兴衰及其对中国转型的启示, 郭强教授论述了政府“不越位”比“有为”重要; 第 4 章介绍了产能过剩、产业升级与技术创

新。贾康经济学家分析了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刘守英教授等人分析了提高产品复杂度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刘学军主编论证了产能过剩与产业政策转型；第5章介绍了产业政策的实践，包括中国关于转售价格维持的立法与执行实践、最低工资标准、开发性金融、建章建制型产业政策、能源环境问题中的产业政策、中国物联网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等；第6章介绍了产业政策未来的发展，平新乔教授分析了关于产业政策的若干理论问题，顾昕教授从产业政策治理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论述了发展主义的岔路口。

研究意义：给定人们对产业政策的不同认识，通过公开的讨论乃至辩论，进而有助于帮助厘清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澄清相关误解，尽可能充分明确地展示各方观点的内部逻辑和外部论证，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全社会对于产业政策的认识，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打下更好的基础，尤其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该著作有助于使得关于产业政策的各方达到“和而不同”的状态。

3. 林毅夫、付才辉：《解读世界经济（试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研究背景：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至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中国经济之所以在世界经济中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得益于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发展与改革成就。林毅夫等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是研究中国经济奇迹的经典之作；2011年，林毅夫首次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移，会给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创造巨大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机会；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我们发布了《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之路》，在此背景下，将其修改为《解读世界经济》的教材。

内容提要：本书共12章，主要内容依次为世界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现状、趋势与方案层面上延续了《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从西潮到东风》、《超越发展援助》和《战胜命运》等新结构经济学系列著作的核心内容。

基本结构：第1章概述了世界经济秩序、格局、理论与思路的变迁，为全书的绪论，并且系统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取代战后旧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思路，概括性介绍了经济结构变迁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第2章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下，论述了经济结构变迁是发展的关键，既是对第1章所介绍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理论深化，也是历史检验。新结构经济学在给定资源禀赋求解最优经济结构，按此理论框架，本章量化核算了战后至今世界各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确认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发展的关键；第3章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追踪了世界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轨迹，并归纳了前沿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以及陷入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结构变迁轨迹特征；第4章探寻了战后发展典范的经济结构变迁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13个经济体实现了连续25年超过7%的经济增长，堪称发展典范，他们具有五个典型特征事实：对外开放、宏观稳定、禀赋积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本章通过一一复原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历程，以案例形式展现了新结构经济学所揭示的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结构变迁的规律，统一解释了他们的典型特征事实；第5章以战后这13个发展典范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轨迹而非发达国家作为标杆，测评了世界各个经济体结构转型升级的达标程度及其效果；第6章以制造业及其就业结构变迁为焦点分析了世界经济结构变迁中的发展与机遇，本章继续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探索了全球制造业就业结构随禀赋结构变化而变化的一般规律与特征，并估算了其缺口；第7章以制约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为焦点分析了世界基础设施建设，本章从局部到整体渐进式改善基础设施的中国经验，概况了世界各地区的水、电、交通、电信、互联网、能源等基础设施随发展阶段而变化的建设状况，归纳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差异；第8章探讨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出路，本轮危机发端于美国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出现的金融体系崩溃，由于发达国家自

身的结构性改革空间有限,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凯恩斯主义进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重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然而,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遭受经济波动的冲击,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是规避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的有效方式;第9章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探讨了走向全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可能性,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凸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本章也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当今非对称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下所采取的在发达国家或主流理论看来是“错误”的货币金融制度安排其实有其合理性;第10章梳理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发达国家依然是中国通过学习利用后来者优势的对象,需要充分利用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发达国家“引进来”也能够促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有带给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转移机会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第11章专门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本章梳理了过去五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进展,包括产能合作与经贸合作区、经贸投资成效、企业转型升级、人民币国际化等重要方面,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中国各地区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参与“一带一路”;第12章总结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世界经济繁荣稳定之路,提供了一套推动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快速、包容、可持续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措施,并附上了一份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开发的新结构经济学“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技术手册。

研究意义:《解读世界经济》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初步应用和检验。

4. 林毅夫、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试行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研究背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也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不上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不上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随后中央在2018年8月24日发布的文件中也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在这些领域培养更多卓越的人才。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明珠,是新文科的重点领域之一。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自主创新的一个方向,也是发展新文科的一个重要探索。在此背景下,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开发了这本《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内容提要: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发端于转型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但引进结构内生性以后,涉及经济运行的所有经济学领域,全书对新结构经济学做了比较完整的导论,全书分上下册共20章,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为指导,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构建真实世界现象背后逻辑体系的十大原理,以及秉持“知成一体”学风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结构经济学应用。

基本结构:上册共10章分别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方法论等,第1章介绍新结构经济学概况;第2章介绍包括新结构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与主要流派;第3章介绍新结构生产理论;第4章介绍新结构增长理论;第5章介绍新结构储蓄理论;第6章介绍新结构创新理论;第7章介绍新结构转型经济学;第8章介绍新结构分配理论;第9章介绍新结构公共经济学;第10章介绍新结构经济学核算。下册共10章分别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新结构经济学第十条揭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生产结构供求原理,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各个领域的引导和应用,第11章介绍新结构政治经济学;第12章介绍新结构产业经济学;第13章介绍新结构金融学;第14章介绍新结构劳动经济学;第15章介绍新结构空间经济学;第16章介绍新结构国际经济学;第17章介绍新结构周期理论;第18章介绍新结构环境经济学;第19章介绍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第20章介绍应用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意义:为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者的必读教材。

第四节 学术会议

两年来(2018-2019),新结构经济学召开了数十场会议,我们从中选出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12场,并将其分为研究院成立大会、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发展政策实践共四个专题。在每个专题下我们依次简要介绍每场会议的主题、讨论内容、达成的共识、学术意义或社会影响。

一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于2018年12月14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与会者对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林毅夫教授将成立大会定义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的誓师大会,他表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将立足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运用与推广,建成引领国际发展思潮的学术研究基地和世界一流的旗舰型智库机构。大会召开了“自主理论创新,引领学科发展”圆桌论坛,围绕“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反思、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术价值、潜在贡献、未来展望、学科建设与合作”展开交流讨论。还召开了“学科建设与合作”“政府和国内智库”“国际发展”和“企业发展”为主题的四个平行论坛,分别就“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期刊合作、学科建设”“新时代下的智库使命”和“新征程中的政府作为”“理念的新趋势和动向”和“实践的行动方案”“中国产业与企业发展研究”进行讨论。

二是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究会议。包括第五届、第六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会议(2018)、《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再讨论暨图书发布会、第四届“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专题研讨会(2019)等。

第五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于2018年8月6日至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主题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与会者围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等收入陷阱、贫困问题、贸易问题和消费与投资等问题展开讨论。Yngseok.Shin、Akos Valentinyi、Alexander Monge-Naranjo、苗建军、金刻羽、王勇等多位颇具国际影响力的教授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来自海内外著名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名学者也相继报告了学术成果。此次新结构国际会议还特别邀请了Erzo G.J.Luttmer、平新乔、朱胜豪、张玉哲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

第六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于2019年8月9日-1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会议主题为“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过去70年的经验”,包括“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宏观发展”、“技术和收入分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金融与发展”五个专题会和围绕“主流发展理论和政策过去、现在与未来发展”主题的两场圆桌讨论会。

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会议于2018年12月13日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办。会议主题是“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学者朱利安·格威茨(Julian Baird Gewirtz)发表《中国经济与40年改革》主旨演讲。与会者就“新结构经济学:导言”“新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思潮的历史”“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40年”“新结构经济学与非洲经济”“经济哲学转变:东方与西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与会者表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对于发展经济学的不同见解,肯定了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体系上所具有的完备性,并对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和能力寄予厚望。

《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再讨论暨图书发布会于2018年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主题是“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与会者围绕产业政策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期进一步厘清分歧、增进沟通,在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产业政策、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领域共同探索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结合的有效路径。八位主创人员基于对产业政策的思考和认知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圆桌论坛环节,各界专家学者从有效性、退出问题、区域政策、企业家视角、投资视角、新经济视角、不同层级政府、公共

管理等角度对产业政策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四届全球经济发展年度高峰论坛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专题研讨会于2019年3月21-22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与会者就中国和西方政府在世界舞台中担当的角色，中国、美国、欧盟三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议题进行讨论。专题讨论包括“市场准入-贸易、外来投资及知识产权”“前沿创新、新技术、创业及产业政策”“鉴于上述主题有关的未来调整和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关系的未来：中国、欧盟、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四个主题，探讨了贸易、外来投资、服务和知识产权对市场准入的影响，美国、欧洲、中国及其他地区产业政策发展背景下的创新、新技术和创业精神，由数据和自动化所驱使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对世界不同地区以及全球发展和全球不平等（鉴于现有的数字鸿沟）产生的影响，以及国家级及多边机构是否能够解决由新技术兴起所带来的问题和隐患以及数字经济所造成的干扰。贸易、外来投资、新技术及创新领域的新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三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会议。包括“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合作”会议、新结构经济学案例大赛和教学研究师资培训研讨班暨招聘会等。

“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合作”会议于2019年5月25日在武汉举办。会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宣告正式成立，研究院各部门介绍相关工作内容和合作设想。全国4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学术期刊的专家学者，围绕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的建设与合作、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讨论。此次会议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学科建设会议，是新结构经济学开放平台合作的起点，有助于更好地团结学术界，共同推动我国自主理论创新的事业。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结构经济学案例大赛研讨会于2018年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举办。参加本届案例大赛的十支代表队分八组对案例进行陈述展示，来自各高校、智库、媒体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政策研究团队的评委对案例进行点评分析，对案例后续推广完善提出建议。举办新结构经济学案例大赛，旨在鼓励学界、智库界、媒体界、业界等关心国家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海内外人士，特别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和在校学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各国、各地与各行各业成功的发展与改革经验（侧重于案例报告），为其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发展提出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侧重于智库报告）。

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教学研究师资培训研讨班暨招聘会于2019年8月12-14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会上发布了国内首部新结构经济学教材——《新结构经济学导论》。林毅夫教授做“新中国70年与我国经济学理论与学科和教材体系创新”主旨演讲。与会者就新结构经济学教材课程建设、教学与人才培养、科研进展、学科建设、校际合作、学术研究、学术发表与出版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探讨，对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招聘需求进行了介绍。

四是新结构经济学政策发展实践会议。包括IFC-PKU非洲工业化论坛、首届中非经贸合作发展论坛绍兴峰会、新结构经济学汽车产业发展研讨会等。

IFC-PKU非洲工业化论坛于2018年11月28-30日，由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INSE）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联合举办，会议主题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工业化——克服困难与抓住机遇”的论坛。与会者围绕全球发展经验、非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数字和颠覆性技术的兴起、制造业是否是非洲现阶段最佳发展方向、东亚发展经验在非洲是否可以复制、突破性技术对非洲工业化的影响，以及制造业是否在短期内被自动化取代等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会者认为，非洲的工业化将为全球提供近乎无限的投资机会，可以帮助非洲大陆的国家实现经济多元化，同时带来更高的增长率，减少外部冲击的风险。非洲国家应在此过程中抓住机遇之窗，整合全球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发展融资基金，促进全球范围的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以突破其瓶颈性限制，促进非洲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型与升级。

首届中非经贸合作发展论坛绍兴峰会于 2019 年 11 月 24 日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会议旨在落实中非论坛精神，丰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进一步深化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林毅夫教授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非洲的机遇》主旨演讲，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为例，向非洲各国政要传递了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理念，为非洲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建议。会上，《中非经贸合作绍兴倡议》发布。贝宁、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分别与绍兴市开发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服务绍兴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园区合作为基础有序“走出去”。大会还召开了中非经贸合作分论坛，旨在落实峰会精神、绍兴倡议和新结构经济学指导下的中非经贸交流方法，切实推进非洲各国政府、工业园区和绍兴市政府、工业园区以及企业达成实质性的合作。

新结构经济学汽车产业发展研讨会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与会者讨论了中国汽车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会议内容包括“理论思潮、工业革命、企业发展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中国汽车产业转型与发展研究”三个主旨报告和“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汽车零部件的制造与再制造”“汽车产业区块链应用”“汽车营销模式的变与不变”四个主题演讲，以及分别围绕“新能源汽车与产业政策”和“中国自主品牌与国内外市场发展战略”主题的两场圆桌讨论会。

参考文献

- [1]. 林毅夫.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C2019006.
- [2]. 林毅夫, 王勇, 鞠建东.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禀赋内涵的探讨[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C2019009.
- [3]. 王勇, 沈仲凯.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J].经济学(季刊), 2018, 17(2):801-824.
- [4]. 王勇, 林毅夫, 鞠建东.因势利导型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一个新结构经济学模型[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C2019008.
- [5]. 彭文平, 揭阳扬.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与市场地作用——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19, (10):80-94.
- [6]. 王勇.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调整[J].学习与探索, 2019, (8):132-137.
- [7]. 赵秋运, 马晶.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传导机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6):18-29.
- [8]. 余航, 周泽宇, 吴比.城乡差距、农业生产率演进与农业补贴——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19, (10):40-59.
- [9].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J].清华金融评论, 2018, (09):105-106.
- [10]. 杨子荣, 张鹏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 2018, 17(2):847-872.
- [11]. 杨子荣.企业盈利能力、金融竞争程度与最优金融结构[J].世界经济, 2019, (6):169-192.
- [12]. 张一林, 林毅夫, 龚强.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管理世界, 2019, (3):31-47.
- [13]. 林毅夫, 张一林, 朱永华.发展战略与银行业结构[R].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C2019005.
- [14]. 任晓猛, 张一林.最优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 一种新的度量方法与应用[J].当代经济科学, 2019, 41(5):1-10.
- [15]. 林毅夫, 付才辉, 任晓猛.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金融评论, 2019, (11):3-13.
- [16]. 朱兰.国家创新能力视角下的中等收入转型——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 40(12):16-28.
- [17]. 任晓猛, 付才辉.发明专利一定越多越好吗?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理论讨论与微观证据[J].财经论丛, 2019, (10):1-12.
- [18]. 任晓猛, 顾夏铭, 蒋海威.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结构与研发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 2019, (1):49-59.
- [19]. 郑洁, 付才辉, 张彩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财政研究, 2018, (3):57-70.
- [20]. 郑洁, 付才辉, 赵秋运.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J].财经研究, 2019, 45(10):4-20.
- [21]. 魏丽莉, 杨颖.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的历史演进——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24-35.
- [22]. 王勇.产业动态、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 2018, 17(2):753-780.
- [23]. 林毅夫, 向为, 余淼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J].经济学(季刊), 2018,

- 17 (2) :781-800.
- [24]. 程锐.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的机理研究——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分工视域的理论探究和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J].西部论坛, 2019, (1) :21-33.
- [25].付才辉.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J].经济评论, 2018, (1) :3-46.
- [26].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初探[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71 (6) :129-138.
- [27].朱兰, 王勇, 李梹剑.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以宁波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R].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C2019010.
- [28].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改革[J].社会科学战线, 2019, (1) :41-48.
- [29].Justin Yifu Lin, Yong Wang. 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 , in Oxford Handbook of Strutural Transforma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30].Justin Yifu 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8, No.E2018011.
- [31].Justin Yifu Lin, Yong Wang. Structural Chang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Middle Income Trap[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E2019001.
- [32].Fei Wang, Junjie Xia, Jiajun Xu. To Upgrade or To Relocate? Explaining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Firms to Rising Labor Cost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9 forthcoming.
- [33].Justin Yifu Lin, Jianjun Miao, Pengfei Wang. Convergenc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analysis[J]. Economic Theory, 2019.2.
- [34].Justin Yifu Lin, Xin Wang.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E2019003.
- [35].Yong Wang and Xuemin Tang. Human Capital,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Skill Premium[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E2019009.
- [36].Michele Boldrin,Yong Wang and Lijun Zhu. The Cyclical Behavior of Factor Shares[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E2019010.
- [37].Shenzhe Jiang, Jianjun Miao, and Yuzhe Zhang. China's Housing Bubbl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E2019008.
- [38].Jaerim Choi, Mingzhi Xu.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the China Syndrome: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n Manufacturing[R].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E2019007.
- [39].Yong Wang. A Model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Income Distribution[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9 forthcoming.
- [40].Qiang Gong, Justin Yifu Lin, Yilin Zhang. Financ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The Manchester School, 2019 87 (2)
- [41].Alfredo Schclarek, Jiajun Xu and Jianye Yan. The Maturity Lengthening Rol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R].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C2019006.
- [42].Dong Wang, Ben White, Amin Muger. China's Energy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National and Sectoral Level Analyses[R].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E2019004
- [43].Justin Yifu Li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overty elimination[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9.9.

[44].Justin Yifu Lin, Zhengwen Liu, Bo Zhang. Endowments, Technology Choices and Structural Change[R].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No.C2019005.

[45].Jiajun Xu and Paul Hubbard. A flying goose chase: 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J]. China Economic Journal,2018.3.